



同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编写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

同济大学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辅助教材

480531



2 030 8617 8

中国革命史辅助教材

同 济 大 学 中共党史教研室

编写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中共党史教研组



同济大学出版社

160081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翔实的史料,汇集了四十一个专题,对中国近、现代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了描述。它生动地展示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进程。

该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和各类成人教育院校的教学用书,与《中国革命史》或《中国共产党历史》教材配套使用。对广大读者特别是对青年是一本有益的自学读物。

责 任 编 辑 袁 学 明

封 面 设 计 徐 繁

中 国 革 命 史 辅 助 教 材

同 济 大 学 中 共 党 史 教 研 室

编 写

上 海 第 二 医 科 大 学 中 共 党 史 教 研 组

同 济 大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四平路 123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同济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9375 字数 246 千字

1986 年 9 月第 1 版 198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3335·002 上海新书目 94—18

印数 1—11000 定价 1.70 元

前 言

进行以中国革命史为中心内容的历史教育，是各类高等学校政治理论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干部教育、青年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书采取专题形式，充实《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革命史》教材内容，通过较为具体、生动的史实，使读者从历史的纵向与横向的比较中，更好地了解中国革命赖以发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规律和历史经验，了解中国是怎样根据历史的必然走上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力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认清我们的时代责任，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思考、回答实际问题的能力。本书可作为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革命史的辅助教材，也可作为干部、青年学习的辅助读物。

本书由同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和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教师合作编写，由王平、张立耀、朱瑞庚、查树林、简秉璇五同志分工统稿，再由丁荫焯、王平、张立耀三同志总统稿。承杨立强同志审阅近代史部分，陈俊愉、唐缙绢两同志审阅现代史部分，并承上海市党史学会理事们和一些兄弟学校关心、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限于水平，不妥之处恳请指正。

编者

一九八六年六月

目 录

前 言

一、血迹斑斑的图画	1
十九世纪的海盗	1
强权即“公理”	3
炮口下的勒索	5
罪恶的商品侵略	7
勒脖子的绳套	9
租借、割让、瓜分	11
二、洋人的朝廷，腐败的统治	15
清王朝腐朽统治下的封建社会	15
从“天朝上国”到“洋人的朝廷”	19
三、外抗强敌内求变革的先驱	25
龚自珍(1792—1841)	25
林则徐(1785—1850)	27
魏源(1794—1857)	29
四、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与人间“天堂”空想的破灭	32
五、洋务运动述评	42
六、康有为、梁启超和戊戌变法	46
七、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52
“和平之法无可复施”	52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53
“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	54
“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	56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58
八、辛亥革命与清王朝的覆灭	60
保路风潮	60
武昌起义	62

建立民国	64
南北议和	65
革命失败	67
九、北洋军阀始末	69
北洋军阀的兴起和发展	69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开始,袁世凯的反动统治	71
北洋军阀的分裂及其灭亡	73
十、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新文化运动	77
“德”,“赛”二先生——新文化运动的总纲领	77
“德”、“赛”二先生的登场,还要借助于“文学革命”	79
打倒孔家店——新文化运动直接战斗任务	79
取“德”、“赛”二先生之长,弃“德”、“赛”二先生之短	80
十一、陈独秀生平	82
十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	87
十三、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	91
十四、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新开端——五四爱国运动	95
五洲震荡惊风雷	95
幻想的破灭,中国人民开始了怒吼	96
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	97
由学生罢课到工人罢工	98
运动势如星火燎原,向纵深发展	100
中国民主革命发展中的里程碑	102
十五、历史的选择——五四运动后各种思潮的论战	104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104
“社会主义”论战	107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109
十六、蒋介石的发家史	112
十七、打倒列强除军阀——北伐战争	118
十八、新军阀混战	126
十九、蒋介石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建立	129

二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之源流	136
甲午战争——日本对中国扩张侵略的开始	136
九·一八事变，日本独霸中国的第一步	137
七·七芦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140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变化及最后破产	144
二十一、宋庆龄和抗日救亡运动	147
二十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和发展	151
二十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161
二十四、鲁迅和“左联”	165
二十五、西安事变	170
“先剿共，后抗日”梦幻的破灭	170
张，杨联共抗日	172
“哭谏”遭拒	174
骊山捉蒋	177
和平解决事变	178
二十六、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182
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	182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	184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	186
抗日战争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	189
二十七、日军侵华暴行	191
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191
惨绝人寰的潘家峪血案	193
血洗扬州万福桥	195
雾都重庆惨遭狂轰滥炸	196
灭绝人性的“731部队”	197
二十八、汪伪政权的建立和覆灭	199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	199
汪伪政权的建立	201
汪伪政权在罪恶中覆灭	202

二十九、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正面战场	204
三十、抗战时期的解放区战场	210
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	210
解放区战场成为抗战中的主要战场	212
解放区军民的全面大反攻，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216
三十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各民主党派	220
中国民主同盟	220
中国农工民主党	222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223
中国民主建国会	225
中国民主促进会	227
中国致公党	227
九三学社	228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229
三十二、接受乎，劫收乎？	231
蒋伪合流	231
各路“英雄”，各逞其能	232
“五子登科”	233
贪污中饱的暴发户	234
四大家族发横财	235
赤裸裸的敲诈	235
丧失民心的劫收	236
三十三、战后美蒋关系	237
美国全面援蒋政策的失败	237
马歇尔的“水上步行”	239
美国再度全面援蒋	241
三十四、翻手为云覆手雨——重庆谈判前后蒋介石两手政策之一斑	245
三十五、伪“国大”闹剧	251
“制宪国大”（一九四六年十一月）	251

“改组政府”(一九四七年四月)	255
“行宪国大”(一九四八年三月至五月)	255
三十六、第二条战线	257
酝酿准备	257
开辟建立	261
深入发展	265
三十七、国民党统治区经济体系的崩溃	270
叹为观止的“奇迹”	270
不堪回首的记录	275
几家欢喜几家愁	278
三十八、战争史上的奇观——解放战争战例二则	281
孟良崮战役	281
淮海战役	285
三十九、新中国是在怎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292
四十、抗美援朝	296
四十一、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及其它	302

一、血迹斑斑的图画

十九世纪，资本主义侵略者英国、法国、美国、俄国、德国和日本，陆续侵入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它们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犯下了一件件以强凌弱的血迹斑斑的历史罪状。

十九世纪的海盗

人们都说十九世纪是给人类带来近代文明的世纪。然而，纷沓而至的侵略者带给中国的却是烧杀抢掠。早期殖民者在象牙海岸、印度、大西洋上罪恶的海盗行径，又重现在一八四〇年以后的中国。

一八四〇年，这是中国人民难忘的年代，英国侵略军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一八四一年十月，侵占了当时全国最富庶的商业中心——宁波，丝绸和粮食抢劫一空，府库十二万银元和纹银被抢光，还勒索一百二十万元“犒军费”。一八四二年七月，英军占领上海，冲进城隍庙、仓库和民宅，抢走财物。当时正是夏季，这批强盗不顾天气炎热，每人穿上镶着高贵皮毛的绸缎外衣，手里拿着绣花扇，酗酒作乐，招摇过市。接着，英军攻占镇江。侵略者见物就抢，见人就杀，连儿童也在劫难逃，繁荣的镇江成了无家不破，无室不空的瓦砾场。

一八五六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次年，英法联军攻进广州城，到处抢掠，甚至挖坟掘墓，从棺材里盗取金银陪葬品，库银二十余万两被洗劫一空，并放火烧毁了五千余栋民房。

北京西郊的圆明园，是一座综合古今中外建筑艺术的大型皇家园林，又是一座聚集着无数的珍奇异宝、文物典籍的博物馆、

艺术馆和图书馆。一八六〇年十月，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开始了疯狂的抢劫。法国公使葛罗承认：以洗劫圆明园为高潮的大抢劫的结果，使普通士兵的口袋里有了二万、三万、四万、甚至一百万法朗……，据说一个团指挥官的珍珠和金刚石，就值八十万法朗以上。侵略者在抢劫之后，为了灭迹，一把大火将这座经营了一百二十五年的瑰丽无比的宫殿焚为残垣断壁。

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北京再度遭受劫难。仅日军就从户部抢去库银三百万两。美军从天津盐道衙门抢走的银子，堆起来达“三十英尺高，三十英尺宽”。法国主教樊国良一人就抢走价值一百万两银子的财物。

在侵略者的烧杀抢掠中，沙俄一手制造的“血洗江东六十四屯”和“海兰泡”惨案，尤其令人发指。

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左岸，面积六千六百 余 平 方 公 里，人口三万多。海兰泡，原名孟家屯，一八五八年改称海兰泡（今苏联布拉戈维申斯克）。两地都是中国居民世居的地方。一九〇〇年七月，沙俄出兵强占东北。七月十六日，大批沙俄军队在海兰泡搜捕中国人，把中国居民的财物抢劫一空。次日，沙俄侵略军把抓来的三千多名中国人赶往黑龙江边，开枪扫射，“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洋”，溺水幸免者仅八十余人。从七月十七日到二十一日，俄军在海兰泡进行了四次这样的大屠杀，夺去了六、七千人的生命。在此同时，沙俄侵略军又在江东六十四屯焚烧房屋，杀害中国居民。从七月十八日至二十日，有七千多中国人被驱赶淹死在黑龙江里或惨死在俄军的屠刀之下。据《满洲旅行记》一书记载，三个星期后，一个俄国军人看到一具具中国人的溺尸在“黑龙江宽阔的江面上浮游，好象在追逐轮船”。“很难估计我们在这天赶上了多少尸体。但是，根据判断，仅在一个沙咀上，我们共数出

一百五十具尸体。这个估计并不多”。

强 权 即 “公 理”

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列强在中国奉行的是“强权即公理”。中国的主权被肆意践踏，人民有冤无处伸。

一条碧波荡漾的江面上，中国的小船三二成群。船民双手摇橹，小船吃力地向前飘去。突然，一艘外国轮船迎面驶来，向小船冲去。顷刻间，江水吞卷着片片木板，船民的头在江面上闪了闪，就再也看不见了……

侵略者的船只在中国的领海和内河横冲直撞，中国的船民葬身鱼腹，这样的事例在近代中国几乎天天发生。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四年在美国的地质学家彭培礼，亲眼看见一艘外国游览船撞沉一只中国小船，四个船民死于非命。事后，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为了娱乐而外出游览时，耽误几分钟时间是无关紧要的，可是外国轮船在遇有舢板或小船碍路时，总是直冲过去将它们撞沉，不管它们上面的乘客有多挤，在中国的水道上，难得有一天没有船只被这样撞沉。有了这样的经历，我以后看到外国人在挤满了人的街上，拿着沉甸的手杖，不停地敲打男女老幼的头在开路，或是看到由于当地人对此束手无策而引起和鼓励同样的凌辱行为经常发生时，也就见怪不怪了”。对于欧洲人和美国人在通商口岸对中国人民施加的虐待和暴行，德国对华扩张的急先锋李希霍芬在他的日记里也承认：“欧洲人对待善良的中国人的态度实在使人愤慨，这也是真的”。

然而，可悲的是，外国人在中国的暴行，清政府无权加以干涉和处罚。一八四二年以后，外国侵略者已夺取了领事裁判权。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只有相应的外国领事有权过问，而他们过问的结果，永远是有罪的判为无罪，杀人的毋须偿命。正是在

领事裁判权的袒护下，侵略者才敢在中国草菅人命，恣意横行。

侵略者在中国胡作非为，并非完全出自个别商人和下层士兵之手。在蛮横无理、仗势欺人、以强凌弱方面，外国的政府官员更是远远超过个别商人和下层士兵。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发生的天津教案和马嘉理案，就是典型的事例。

早期到中国进行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企图以十字架征服中国，是侵略者打开天朝大门的重要帮手。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中“护教”条款的保护下，深入中国城镇乡村，租买土地，建造教堂，并以教堂为据点，进行各种违法活动。在天津望海楼，法国传教士建立了天主教堂。他们在附近强占民地，拐骗人口，早已激起天津人民的义愤。一八七〇年六月，天主教育婴堂收养的婴儿死去三四十人，尸体溃烂，惨不忍睹。同时，天津地区不断发生拐骗幼童的事件，拐犯供认“系天主堂主使”。群众多次围聚教堂附近，要求放出孩子，该堂负责的修女同意由五名群众代表进入育婴堂检查。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得讯，赶到育婴堂，怒斥群众代表，把他们轰出堂外。六月二十二日，丰大业持枪直奔北洋通商大臣崇厚的衙门，要求派兵弹压，并开枪恫吓，毁坏官衙器物。他奔出衙门后，路遇天津知县刘杰，竟公然向刘开枪，打伤其随从高升。被丰大业的暴行激怒的天津群众，把丰大业当场殴毙，随后又烧毁法国教堂、育婴堂，捣毁法、英、美等国的领事署，打死外国教士、商人和官员多人，酿成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是法国领事丰大业的蛮横残暴的行为引起的。可是，事发后，法国却联合英、美、俄、德、比、西等国，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派出军舰集结天津、烟台示威，要求清政府惩办有关群众和地方官员。清政府屈服于侵略者的压力，一面派钦差大臣赴法国“谢罪”，一面令直隶总督曾国藩赴天津查办。结果，二十人被处死，二十五人被流放，法国侵略者还勒索了五十

多万两白银，作为赔偿费和抚卹金。

一八七五年二月，英国驻华使馆派出的翻译官马嘉理，带引将近两百人组成的英国武装“探路队”，擅入中国云南蛮允附近。马嘉理蛮横地向当地群众开枪行凶，结果被愤怒的群众打死。案发后，英国政府增派军舰来华，向清政府施加军事压力。腐败的清政府在英国多方威迫下，捕杀了被认为是“凶手”的中国民众十多人，并且经一年多的交涉，于一八七六年九月，同英国订立《烟台条约》。英国除了取得二十万两白银的赔款，还取得了扩大领事裁判权和多项商务特权。

侵略有赏，爱国有罪。中国人民除了拿起武器赶走侵略者、打倒卖国政府外，没有其他选择。

炮口下的勒索

侵略者是敲榨勒索的老手。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侵略者利用大炮呼啸所产生的压力，对清政府进行了无数次的经济勒索。这些勒索或是在攻城掠地之后迫使清政府出钱“赎买”，或是在战争结束后强迫清政府付给战争赔款，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一八四一年四月，英军进逼广州。奕山撤离广州外围炮台进入广州城。二十七日，奕山为安全起见，派广州知府余保纯与英军首领义律订《广州和约》。在《和约》中，英军答应可以不破广州城，但广州知府必须交付六百万元作赎城之用。英军还蛮横地规定，六百万元从五月二十七日算起，一星期内付清。如一星期内未全部付清，即增加至七百万元。如十四天内未付清，即增加至八百万元。如二十天内未付清，则增加至九百万元。

一八四二年六月，英军进犯吴淞炮台。吴淞炮台守将陈化成带领爱国官兵奋勇抵抗，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全部牺牲。上海、宝山相继落入敌手。英军离开上海时，故伎重演，向上海道提出

須以五十万银元作为赎城的费用。

一八六四年，新疆地区回族、维吾尔族人民起兵反清所建立的几个地方机构，被封建主一一窃夺。由于封建割据和次年浩罕汗国军事头目阿古柏率军的入侵，整个新疆地区陷入动荡之中。一八七一年六、七月间，沙俄以防范叛乱分子侵扰俄国边境为借口，派兵侵占了中国伊犁九城及附近的地区。一八七五年，左宗棠衔命去新疆平定叛乱。二年后，恢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所有新疆地区。一八七八年，清政府先派崇厚，后又改派曾纪泽去俄国交涉收回伊犁的问题。一八八一年二月，订《中俄伊犁条约》。在该条约中，沙俄虽同意交还伊犁，但同时又提出，清政府必须向沙俄交付九百万卢布的“代守费”。

一八九五年日本军国主义通过《马关条约》强占中国辽东半岛的举动，激怒了俄、法、德三国。俄国对中国东北早有野心，决心不惜一战，强迫日本退还辽东半岛，以便日后由俄国占领。德国一则想在中国获得一港口，另则想改变俄法同盟对德的性质，引诱俄国向东发展，因而积极支持俄国还辽的建议。法国与俄国是同盟国，同时又想先施恩于清政府，为日后的勒索垫下本钱，因而对还辽的建议也持积极的态度。结果，日本无法承受三国联合的压力，被迫吐出辽东半岛，但要清政府拿出三千万两白银“赎买”。

对侵略者的勒索，清政府及其地方政府忍气吞声，一一照付。然而，侵略者的勒索，和巨大的战争赔款相比，又是小巫见大巫。

从一八四〇年到一九〇〇年，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外国侵略者以胜利者的姿态蛮横地要求清政府赔偿兵费和其它费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英国迫使清政府拿出白银二千一百万元。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英、法两国又迫



使清政府赔款白银八百万两。以后随着清政府软弱无能的本质日益暴露，侵略者的勒索越来越苛刻。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日本侵略者竟要清政府赔款白银二亿两。而一九〇一年的庚子赔款则高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而且规定，清政府分三十九年还清。三十九年中本息合计九亿八千多万两。当时清政府年收入是八千万两，为偿还以前的赔款，已经借了四亿两，加上庚子赔款的本息金，清政府背上了十三亿八千多万两的外债。清政府把这些负担转嫁到人民头上，广大人民的生活几乎陷入绝境。

罪恶的商品侵略

闭关自守的大门被大炮强行打开后，外国商品如潮水般的涌入中国。大炮为商品开路，商品依靠大炮发挥着掠夺中国的职能。

早期西方资本主义东销的商品，主要有棉、毛纺织品和少量的金属制品。这类商品在中国销路不佳。因此，中外贸易的初期，中方一直处于顺差地位，英国及其他国家每年须用大量白银到中国购买他们需要的丝、茶等商品。为了扭转这一局面，英国商人及其政府发现，鸦片是一种有用的商品。

在英国，贩卖鸦片是要被判处死刑的。但是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贪婪本性，却使英属印度政府于一七七三年确立了鸦片侵华的政策。从此以后，鸦片输入量急剧增加。美国、葡萄牙等国商人也加入了这一罪恶买卖勾当。

罪恶的鸦片贸易，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烟毒泛滥成灾，白银大量外流。据估计，一八三五年全国吸鸦片者二百万人以上。从一八二〇年到一八四〇年的二十年间，中国外流的白银约一亿元左右，相当于当时中国银货币流通总量的五分之一。平均每年流出白银五百万元，相当于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十分之

一。鸦片贸易改变了中国在中外贸易初期的顺差状况。

鸦片战争后，列强对华商品输出大量增加，以英国为例，其输华商品总值，一八三七到一八三九年平均不满一百万镑，一八四三年增加到一百四十五万六千多镑，一八四五年竟达二百三十九万四千多镑。其中，棉织品占很大比重，一八四三年为八十七万一千多镑，一八五四年为一百七十三万五千多镑，各占商品总值的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七十二。在棉织品中，又以棉纱为大宗。

洋纱大量倾销中国，中国手工棉纺织业无法与之竞争，纷纷倒闭，号称棉布“甲天下”的松江、太仓地区出现了“无纱可纺”的现象。即使有些地方有纱可纺，并织出了土布，也因售价高于机织洋布而销路大减，不少人只能将价格“削减大半”出售。“无纱可纺”和土布销售环节的中断，使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手工棉纺织业日趋萧条。同时，原来以生产土布为主的工匠和以贩运土布为生的船运工，由于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萧条而纷纷失业，加上大批农民破产，就为资本主义掠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提供了便利，罪恶的贩卖华工的活动由此开始。据统计，从一八四七年到一八五〇年的三年内，仅厦门一地被掠卖的华工有一千三百人。一八五〇年一年中，广州一地被掠卖的华工达三千一百一十八人。侵略者勾结中国的地痞流氓，在街上或在海边看见良家子弟，就一拥而上，用绳索捆扎结实，然后用烧红的烙铁在脸上烙上字印，扔进窄小的船仓，象猪仔一样，偷运出境。途中，由于拥挤闷热，死亡率常高达百分之四、五十。掠卖华工手段之野蛮、残酷，连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与奴隶贸易毫无区别的贸易”。